

# 对自己的一份期冀 给世界的一份温柔修辞

## 小说集《暗疾》创作谈

◆ 薛舒



先说说《暗疾》中的四个“中女”故事吧。第一篇是同名小说《暗疾》，灵感发源于我自己。我是一个过敏性荨麻疹患者，发病大多突然，从胃部痉挛开始，直至面部发热充血。第二天早上起床洗漱，我会在镜子里看见一张暗红浮肿的脸，双眼在夹缝中露出细弱的疑虑。诱发原因无迹可寻，依照经验，我需要吃一颗“开瑞坦”，让面部的红肿在半日内隐匿。但我也知道，倘若不用药，病症也会在不经意中渐渐消退。“有些病，根本不是病，你把它当成病，它就是病了，你不把它当病，就不是病，不用打针吃药也能好。”——这是我先生对我说的话，绕口令似的，貌似缺乏科学依据，与他作为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极不相符。但他经常说这样的话，连带一些有关神经生物学的专业词汇。有时候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是对的。在小说中，男主人公王一阳也经常对许亦非这么说。

“她不用小心翼翼，不用欲擒故纵，不需要为小小的虚荣心在他面前装弱、装纯真，不需要为了利益暗暗算计，抑或出于尊严不肯表达自己的欲望。”——这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，用评论家李伟长的话来说：薛舒看似在讲一个中年女人的婚姻故事，根本上讲的是如何发现自我和伴侣的不完美并接受彼此的事实，她有意通过创造最符合彼此性格的婚姻方式，来探究婚姻中人的存在感和安全感源自何处。小说中的暗疾是一个象征，可以

是身体的过敏，丈夫口中的浊气，另一个男人性格的怯懦，也可以是男女之间无事发生的那个夜晚。一旦感觉到生活的不如意，身体的暗疾(过敏)就会来袭，严重时药物也不管用。既是暗疾，就难以明言，只属于患者自己，是这个人对外在事物和秩序遭受破坏的综合反应。克服身体的病可以依靠药物，应对心理上的隐痛则要困难得多。薛舒选择了用小说的方式直面它，尝试让人物从日常生活中走出来，从对他人的依赖中脱离出来，从而获得真正的主体自由，重建一个女人的自主。

第二个故事叫《飘飞的雪花》，男女主人公因爱情而结合，却在一地鸡毛的家庭生活中矛盾重重，直至分道扬镳，但他们离婚不离家，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有一天，女主人公收到了一个叫“萨维德拉”的人的手写来信，这开启了一场关于爱情的追溯。小说源自一次整理旧物，搜出一堆学生时代留下的信件，一时感慨，于是想，写一个小说，写一种被淘汰的通讯方式，也写写那些被淘汰的情感，比如，爱情。在实用主义至上的今天，人们好像很少抽离具体生活去谈论爱情，家庭出身、经济条件、学历职业，甚而家务琐事……当一对婚姻中的男女发现无法再生活在一起，那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消失了吗？小说中，我让女主人公收到了三封手写纸质信，署名“萨维德拉”。当然，真正的“萨维德拉”是作者，作为“中女”，我仿佛在给自己写“情书”，有种重

拾“爱情”的治愈。

《北窗》的灵感，来自一条网上读到的八卦新闻：一女子因配偶出轨欲跳楼，在窗外悬坐许久，楼下围观者无数。正当她欲跳未跳犹豫不决之际，对街小区某栋高层突然跃下一人，当场死亡……八卦新闻至此结束，没有后续，而我的想象是：围观者迅速移至对街小区，若干分钟后，再次想起前一位“轻生者”，转身，抬头，发现适才的窗外已无悬坐女子，窗户紧闭，一切安好。我的想象，也许属于生活中更属于文学的部分。我同样相信，在现实中，那个意欲为情赴死的女人，也许并非真的想死，她只是在等待一条能够说服自己的生路。人生下坠之际，能够温柔接住她的，也许只有她自己。

《最后的渔村》，地点原型是上海的金山嘴渔村，偏安于都市边缘。渔村里的居民大多经营饭店、民宿和土特产店，那里卖的海货来自浙江舟山。十五年前，我生活在金山的时候，经常会去渔村打牙祭，那里靠海堤的公路边有一连串的饭店可供选择。小说发生在渔村里，女作家离开爱人，去渔村闭关写作，在经历了一系列荒诞遭遇后，发现身躯的“离开”并不能让她从生活与情感的困境中自拔，也许，她更需要的，是一次精神的自拔。“金山嘴渔村”也被称为上海“最后的渔村”，在那里，你可能会闻到来自清朝的海腥味。作为小说标题，“最后”的意思，我愿意解释为觉醒

之后的“放下”，抑或是“解脱”。

《暗疾》出版之际，出版社编辑给出了推荐语：中女的“反击”，是送给世界的一份温柔修辞/没拆的信，关着的窗，在那些无事发生的夜晚，她终于懂得了如何接住自己的全部重量。小说集《暗疾》聚焦四位生活稳定同时面临内心风暴的中年女性——在婚姻或情感世界里，我们如何处理心中的隐痛？如何面对爱的损耗？如何过一种明亮的女性生活？

最近网上比较流行“中女”的说法，在没有查阅DeepSeek前，我一直把它解读为“中年女性”的缩写。我喜欢这个内容简介，不仅因为它突出了作为女性生活的主题，更因为“温柔修辞”这四个字，那“不是无可奈何的妥协，不是惶恐无助的退守，不是走投无路的哭泣，更不是带着恨意的报复，而是女性在理解了婚姻生活真相之后所做出的自我觉醒和自主选择。”——再次引用评论家李伟长的话，我确信，中女的“反击”，也许更是一份对自己的期冀。

好吧，抄一段DeepSeek的总结：“中女”是需要结合语境理解的词汇，既有年龄分层的客观性，也可能隐含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。在当代语境中，越来越多的讨论倾向于打破年龄束缚，倡导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自我价值。例句参考：这群“中女”活出了独立女性的精彩。

DeepSeek给了我一个确切的理由，于是，对自己的这本新书，我便也有了更多的偏爱。

“他们的创业史就是一部花样百出、精彩纷呈的失败史。比他们最后的成功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么多年，一次又一次，他们居然从未被那些失败压垮。”这是非虚构作品《海边的小院》作者、作家阿禾为长辈的“折腾史”做的总结。

一对半路夫妻，成婚时无片瓦遮头，更无立锥之地，他们趁海潮退歇的间隙，徒手从海滩中刨海泥，立围挡，建成一个小院——一个后来建成了近半世纪、哺育了三代“硬骨头”的小院。外公外婆在烂泥和盐场里谋生，捡破烂、赶海，想尽办法养活儿女，让一个家族在此开枝散叶。

几十年里，小院变成一个家族与不幸对战、与命运周旋的根据地。除了外公外婆，小院还住过许多人：不识字的母亲与父亲，夫妻俩从挖弹涂鱼、收购弹涂鱼、菜市场摆摊到开鞋店、开厂；在家具店、皮鞋厂、葡萄园中反复跌倒又爬起的姨妈……他们在潮汐之间谋生，于风浪之中“抢生活”，这里永远是给他们托底的，让他们在困顿时得以喘息、重振旗鼓的地方。

再后来，更年轻的一代从小院走出，这一代“出走者”，在新的时代里追寻梦想，也遭遇破相、负债、离散之痛，但血脉中那份来自小院的强韧，始终是他们面对世界的底气。故事结尾，小院被拆除，但是它仍然不断被回望、被铭记。

在这部绵延近半个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里，还有更多鲜活的身影：有天才般的艺术直觉却又因做倒爷而瘫痪的舅舅，后半生在轮椅上编织新的活法；被称作“小刘德华”却

在18岁破相的堂哥，用不死心的劲头在矿井、皮鞋作坊与广州档口攒出家底；堂姐每年养的鱼都被台风席卷一空，在父母的索取与海潮的掠夺中屡败屡战；还有信奉“什么都是生意”却莫名破产、被迫远走他乡后终于还清债务的伯母，以及人生因抓海蜈蚣而大起大落的婶婶……

其实，与长辈们一样，阿禾的人生也充满了不确定、停顿和重启，她分别在高中和大学两次退学，只为找到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”的答案，哪怕第二次退学时，她离开的是众人向往的名牌大学。“小院家族”是倔强的、硬骨头的、不安分的，他们蓬勃而顽强的生命力就像草籽，抓地生根；但他们又是本分的，本分地相信自己的劳动，本分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有收获。这大概也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最“笨”、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吧。

在故事的结尾，阿禾以一句“我们都得活啊”，将这个作品从“人”拉到了“仁”的角度。因进山找毛竹而借住在山里人家的母亲，在起夜时发现了厨房里的蟑螂，那一刻，她看到了除自身以外，也跟她一样拼命谋生的其他生物。人人都在谋生，谋划、奔忙、迁徙、吃苦。不仅如此，在生活终于安定富足的晚年，他们还看见了“人”以外的生物，他们那原本已被困顿和得失打磨得坚硬的心，蓦然生出了让人动容的悲悯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也许都有这样一座海边的小院，它是故乡，是起点，也是我们共同奔赴的理想生活。它告诉我们，活着不容易，所以更要热气腾腾地活着，相信劳动、收获与公平。

## 本分地活着，欢腾地向前

读《海边的小院》

◆ 黄文娟



照料家人是永恒的生命命题，无论在哪个国家、哪个时代。

《照料母亲十一年：关于责任、爱、死亡，以及矛盾心理》的作者琳恩·蒂尔曼是美国著名小说家，深耕文艺界数十载。这本自传体的非虚构作品曾以书摘形式刊登于媒体，引发热议。备受争议的边缘之一当然是家家户户都会遭遇的养老问题，之二则针对已普遍存在于当代社会的照料外包现象。

面对父母病至老死的非虚构书写已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体。从菲利普·罗斯的《遗产》到波伏娃的《她弥留之际》，到我本人的《查无此人》，再到2024年林雪虹的畅销书《林门郑氏》……世界各地的作家都珍视这类现实题材，无一例外地从疾病出发，回看亲人、家族和自我的来处，在照料时领悟生命的真谛，囊括了对逝去的时代、信仰、战争、哲学、女性生活经验等多重视角的反思。充沛而富有多样性的文本积累至今，足以让我们明白：每个家庭都值得一本微型民族志。

蒂尔曼也是这样写的。八十岁的老母亲突然出现异样，三姐妹共同承担照料的职责，因为作者的职业是教学和创作，时间相对自由，住址离母亲的公寓最近，因而承担了最多临时性的杂事。但作者要叙述的重点不是事务性的，更多落在复杂的母女情感上——母亲也曾是心比天高、天赋超群的年轻女孩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全职主妇，尽心尽责地照料生病的丈夫，但在这对母女之间始终存在裂痕。假如女性无法充分发挥天赋，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，那么，内心的种种不甘就可能

# 照料的外包与内耗

◆ 于是

投射、转嫁在儿女身上：蒂尔曼深知母亲对女儿的嫉妒，而失智、失能、失忆等症状只会将其放大，成为照料者心中的芒刺。

和所有照料者一样，蒂尔曼姐妹首先要应对的是确诊问题：究竟是脑积水、癫痫还是阿尔茨海默病？究竟是可治疗的还是不可逆的？照料者的心态很天真，无意成为医药专家，但在仰仗专家们的过程中，蒂尔曼批判了那些傲慢、冷漠的男性医生，以及消费社会中的所谓“高端”医疗服务。事实上，透过母亲的病，她第一次看到社会的隐藏面——隐藏在艺文、上流等种种茧房之外的真实世界，第一次切身感受到：科学尚且不能充分解答人类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以科学之名但罔顾人性的权威发言更不可取。而这，恰恰是所有照料者首先要面对的残酷真相——患者可能被误诊、被忽视，更可能因为年老病重而被歧视或被放弃，甚至被视为浪费资源的“废物”，从社会的视野中消失，成为只能让家庭消化的问题。

但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是蒂尔曼冷静、坦诚地写出了这种照料是多么不情愿，多么违背自我，“我就是做不到”。在崇尚传统家庭美德的人看来，这大概只比大逆不道好一点点；但在崇尚个人自由的人看来，这是无比诚实的自白。蒂尔曼三姐妹没有像英国畅销书《不情愿的照料》的匿名作者那样放下自己的生活，全天候陪伴在父母身边，而是和大部分城市居民一样，进行了理性的家庭内部照料责任分配，选择了外包方式——为母亲雇佣住家护工。

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由此而

来：为什么这样一个有三姐妹、可以一掷重金请护工、换有名的医生、享受豪华病区服务的家庭，照料母亲养老还是那么难？

难在哪里？首先是无人可挑。她们试过名字花里胡哨的中介公司，推送来的护工往往不尽如人意还要价昂贵；她们不喜欢情感过于强烈或坦然自若蹭东家食物的护工；她们似乎找不到受过专业培训、日夜陪伴母亲十年的护工是个非法移民，几乎没有培训，没有经验，因为这份工作，遭遇了丈夫出轨，和孩子常年分离。蒂尔曼直言不讳地写道，因为依赖护工，她们宁愿给护工女儿的婚礼买单，宁愿对她偷窃的事实视而不见，宁愿出钱让她去接受再教育。

在这种“宁愿”背后的不情愿里，蒂尔曼还坦言了另一层顾虑：她清楚这种雇佣本身是不公平的，但又不得不屈从现有的这套市场规则。或者说，照料市场的潜规则：无论是家族中的女性，还是外包雇佣式的廉价劳工，都面临一个更宏大的难题：照料工作始终是被社会忽视的，乃至被视为无偿的。可悲的是，在老龄社会带来的老年消费热潮中，被照料的老年人有可能是消费的对象，并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公平。

恰如医学人类学的奠基人、《照料》的作者凯博文教授所言：“照料能让我们成为拥有社会性的人，能让我们巩固并强化我们的集体存在。”蒂尔曼外包了照料，和母亲的龃龉也并未和解，但她写下的每一次崩溃、每一种反思，都是这十一年带给她的深刻教育，让她从一个人、一个家走进了充满结构化问题的复杂社会。